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鲁克俭 著

Hot Issues of Marxism Studies by Marxologists Abroad

中央编译学术文库
Zhongyang Bianyi Xueshu Wenku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 热点问题

鲁克俭 \ 著

Hot Issues of Marxism Studies by Marxologists Abroad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鲁克俭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9.

ISBN 7-80211-314-8

I. 国... II. 鲁...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643 号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178 千字

印 张: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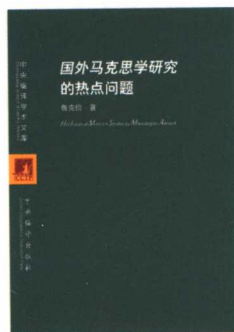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鲁克俭

河南平顶山人，法学博士，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编委会成员，并主持翻译《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已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科学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论文20多篇，合著《解放思想史话》，参编《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中央编译学术文库

策划编辑 / 董 巍 责任编辑 / 董 巍

封面设计 / 田晗工作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本书获得了

中央编译局社科基金（2003年度）

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基金（2003年度）资助

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2006年度）

导 论

本书是对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系统的介绍和评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跟踪研究。在导论中，主要回答一下什么是“马克思学”，以及对国外马克思学进行跟踪研究有何意义这两个问题。

—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到“马克思学”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它的贬义，即西方学者打着学术旗号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系统的歪曲研究。Marxologie 这个词（它对应的英语词是 Marxology）尽管是由吕贝尔最先造出来的，而且吕贝尔确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不能因此就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学”的含义。实际上，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梁赞诺夫所做的 MEGA1 编辑工作就属于马克思学的范畴，而且吕贝尔也以梁赞诺夫事业的继承者自居。现仍然健在的巴加图利亚教授也自称为 Marxologist，即马克思学家（或马克思学者）。需要指出的是，前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所以激烈批判“马克思学”，

并非批判“马克思学”本身，而是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作为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进行学术性研究的“马克思学”，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不但一些西方马克思研究者做的是马克思学研究，前苏联、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研究也属于马克思学范畴。这可以说是广义上的“马克思学”。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狭义上理解“马克思学”。整体来看，前苏联、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学研究以马克思著作的版本研究见长，缺点是容易固守教科书中的已有结论，常常出现“新材料旧结论”的情况；西方国家的马克思学研究以“解读”见长，研究者思想比较活跃，擅于提出新问题，做出新结论，但版本考证工夫明显不及苏东。关于冷战时期东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比较，需要专文探讨，这里不再做进一步发挥。这里只需指出的是，本书所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不包括对前苏联、东德马克思版本研究的介绍，因此是在狭义上使用“马克思学”一词的。当然，为了避免读者对马克思学产生贬义的联想，本书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而不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这里还需澄清一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人们有时会笼统地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它既包括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思想家中不乏对马克思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都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总体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其研究套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分析和批判；“国外马克思学”则主要是面对马克思文本本身，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做的学术性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区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思想”与“学术”的分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以思想家的形象出现，而国外马克思学者通常以专家的身份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而且有些人会身兼两种身份，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就是如此。

20 年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国外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态度可以用趋之若鹜来形容。而与此相应，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直到现在国外各主要马克思主义流派都已经被介绍过来，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陷入了无“流派”可介绍的窘境。相形之下，人们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纯学术研究重视不够，对国外马克思学取得的研究成果介绍不多，研究不够。甚至连吕贝尔这样著名的马克思学家也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吕贝尔的著作至今还没有中译本，也没有针对吕贝尔的专题研究著作面世。在这种情况下，澄清“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突出“国外马克思学”不同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对于深化对国外马克思学的跟踪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

国外（主要是西方）马克思学的跟踪研究到底有何价值和

意义呢？首先，这种跟踪研究是应对国外马克思学挑战的需要。国外马克思学者思想活跃，擅于提出新问题，做出新结论，但他们的一些新结论却是我们无法苟同的。但也不能因此而武断地说国外马克思学者是有意歪曲马克思思想以达到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自然不排除有些西方学者确实抱着这样的目的在做马克思学研究，但多数马克思学者确实是抱着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实际上，国外马克思学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的学术争论。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曾流行一时，但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论”与“对立论”针锋相对^①。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面对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我们所不同意的新观点，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了事，而应该做相应的深入研究，开展积极的学术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中国学派的马克思学。

其次，这种跟踪研究对促进国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意义重大。

近年来，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重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它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新的生长点之势。“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尽管是一个新提法，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做的马克思研究就是文本解读研究。“文本”是一个解释学的概念。就马克思的“文本”来说，除了马克思本人，其他人在面对这些文本时，也就是在进行“解读”。“读书”，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马克思研究者也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

是在“读书”，是“读者”。但马克思研究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因为研究者的“读”是带有研究性质的。这就是说，一方面，研究者的“读”要比一般“读者”读得深，能读出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读”是有学术积累的，后来的研究者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解读”。而如何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也是每个研究者都会自觉思考的问题。

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研究者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方法论自觉。

1.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基于 MEGA2

研究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他并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进行解读，而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相关的有价值的材料。研究者依据已有材料做出的解读结论，在新材料出现后，其可信度就要经受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既有解读结论被新材料所“证伪”，或者其可信度大打折扣。而这也是一个学术积累和进步的过程。就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从解放前只有少数马克思著作被译成中文，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全部出齐，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材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深度也大大提高了。不少老一辈马克思研究者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对马克思文本所做的解读研究达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致。年轻一代的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超越前辈，就必须利用新材料，特别是MEGA2。从我自己的研究实践来看，利用MEGA2确实可以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

这里试举一例。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曾经引起不少国内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些新的解读结论。其中有代表性的

观点是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历史学笔记》是为了利用新发现的实证材料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唯物史观。这一说法乍看颇有道理。但当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编年史摘录”，而是把这一“编年史摘录”放到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研究的大背景中时，就会发现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编年史摘录”只是他一生所做7个“编年史摘录”^①中的一个，只不过这一个篇幅稍大一些而已。而经过考察我们发现，马克思有做“编年史摘录”的研究习惯，就像他读书时有做笔记的习惯一样。做“编年史摘录”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只是他做相关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果这样来看待马克思晚年所做的“编年史摘录”，那么抬高《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就难以成立，顺着这一思路所做的解读结论就被新发现的材料所“证伪”。

之所以说是新发现的材料，是因为这7个“编年史摘录”中有3个是在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中。特别是关于法国和德国这两个较长的“编年史摘录”，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MEGA1对《克罗茨纳赫笔记》有过节录，而且该节录的中文译文也公开发表^②，但从节录根本看不出它们是类似于马克思晚年做的《印度史编年摘录》，人们很容易把它们当作是马克思阅读法国和德国史著作时所做的摘录笔记。只有

^① 参见鲁克俭“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写作《历史学笔记》”，发表在《理论前沿》2006年第2期。

^② 参见曾宪森、熊子云译“马克思1843年克罗茨纳赫摘录笔记”，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3期，后收于《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MEGA2 第四部分完整发表了《克罗茨纳赫笔记》后，它们作为“编年史摘录”的真实面目才显现出来。

尽可能利用已有的材料，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利用新材料，才能做出新结论。一些西方马克思研究者甚至专程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查阅马克思手稿，从而做出了新的发现。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整理并最终出版了《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国学者一般没有条件这么做，但利用好 MEGA2 却是新一代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在 MEGA2 新材料不断发表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仍然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 卷，就会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落伍。特别应该引以重视的问题是，不去有意识地利用新材料，就会给思辨留下发挥的空间，就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可以说是“过度解读”的典型。尽管阿尔都塞在解读中运用了著名的“症候阅读”法，但他提出“断裂说”所依据的马克思文本材料是很有限的。阿尔都塞晚年精神病发作后曾坦白说，自己并没有读多少马克思的著作。阿尔都塞无疑是天才的思想家，其“断裂说”不乏真知灼见，但“断裂说”毕竟是缺乏充分文本依据的“过度解读”。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学者指出它与马克思文本证据的矛盾之处。就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在充分占有和利用新材料上下功夫，而是期望靠丰富的想象力和强有力的思辨做出阿尔都塞式的“新发现”，就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的泥潭。

2.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以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为基础

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历史上，新材料的出现（特别是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著作手稿在 20 世纪相继发表）极大地深化

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另一方面，马克思版本专家在版本考证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也影响到既有的解读结论。比如一些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著作的文本后来被判定为别人（如恩格斯、费尔巴哈、赫斯等）的作品，这势必会改变以往的某些定论。尤其是伴随着 MEGA2 的编辑出版，马克思一些著作的版本问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本的修改情况、文本各部分的编排问题、文本写作时间的确定、文本的真正作者、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的关系等）进一步得到澄清，将极大地深化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等基本思想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把握和认识。MEGA2 各卷的编辑者关于相关文本所做的版本考证在各卷的资料卷中有详尽的说明，因此利用好 MEGA2 资料卷是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重要一环。在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者的解读结论与版本研究的新成果相矛盾，研究者就应该正视这种矛盾，要么调整自己的解读结论，要么做进一步的版本考证，从而否定 MEGA2 编辑者的考证结论。不管怎样，无视已有的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都不利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深化，也很容易导致对文本的过度解读。

3.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擅于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

对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利用马克思著作的既有中文译本是一个便捷的途径。但为了解读的准确性，研究者有时需要对照马克思的原文，必要时还需对照各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所指出的那样，“翻

译也是解释”^①。马克思有些话也许参看原文也无法准确理解，但参照其他语种的版本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各主要语种的翻译者大都是马克思研究的专家，翻译本身就渗透了他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因此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实际上也是借鉴前人的智慧。

在参照各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过程中，一些研究者甚至会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发现某些语种的版本在某些地方存在误译，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结合马克思的某句或某段话的翻译来谈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解读，也可以成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一种“套路”。

4.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连理工科研究生都知道，阅读国外相关文献是做研究的前提。但对做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国内学者（更不用说研究生了）来说，不了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径直做“解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做研究首先要阅读已有文献，这是每个研究者都知道的道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马克思研究者更多只是阅读中文文献（或者译成中文的国外著作和论文），而没有直接阅读外文文献的习惯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基本上仍处于与国外研究相隔绝的状态，国内学者既缺少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也感受不到与国外研究的差距。

就国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来看，有三

^① 参见《后现代马克思》(Terrell Carver, *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7章“翻译与解释：马克思的话”。

类问题比较常见。第一类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这些问题类似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关于一个针尖上能站5个天使或6个天使的讨论，讨论尽管热烈，甚至引经据典，但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第二类问题是拿来国外学者曾经或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如人道主义、异化、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等等。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虽有所了解，但常常是略知一二，或知之不详。于是在围绕这些问题做研究时，常常是花了很大气力并自认为得出了新结论，但其实只是重复（甚至低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是做了低水平的重复性劳动。以“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的研究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先是“对立论”一度流行，后是“一致论”对“对立论”所提出的每项论据都逐条进行批驳。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当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所谓“差异”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得出的结论不但已经有国外学者早就提出过，而且已经受到“一致论”者的有力批驳。因此，致力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如果在解读之前不首先花些工夫阅读外文文献，就难免出现类似的重复性研究。

第三类问题是貌似新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国外学者已经探讨过的问题。能够提出新问题，应该说是学术进步的标志。但在没有阅读外文文献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自认为提出了新问题，实际上早已有国外学者做过深入探讨的情况。比如近年来国内学界讨论比较多的关于马克思是否主张“消灭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国外学者对该问题早已做过深入探讨，并产生了多种观点：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消灭哲学的说法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而非哲学本身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确实认为应以实证科学取代哲学；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拒绝哲学，但 1857 年之后又重新接纳了哲学。如果探讨该问题的国内学者能够首先熟悉这些国外文献，那么自己在做研究时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就会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平台上，也才有可能与国外学者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毫无疑问，国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总是跟在国外学者后面，新一代学者有责任为构建马克思学的中国学派而努力。但“创新”首要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无视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奢谈“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在短时期内要求所有的国内学者在做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时都直接阅读原文文献并不现实。因此，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目前仍然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它可以廓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地基，缩短研究者进入前沿学术问题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本书都是基础性的，它无法替代研究者针对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搜集和阅读相关外文文献。对作者本人来说，对国外马克思学热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也是下一步深入进行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必要准备和坚实基础。

国内学者对国外马克思学的评介性研究已经有余文烈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和叶卫平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两本专著。余著虽然没有打马克思学的旗号，也仅限于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但就所讨论的问题（唯物史观、剥削、阶级、正义、道德等）来说，应归于马克思学范畴。叶著讨论了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说”、